善的回应 爱的循环

怡 然

在一个又一个“最美”涌现，并逐渐塑造“最美”中国的时候，上海的“最美钟点工”现身了。来自湖北的钟点工何益红和邻居一起买菜回家，当一辆宝马车突然迎面撞来之际，她一把推开邻居，自己却被宝马碾压于车下，昏迷8天8夜。醒来后，她的第一反应并非向肇事司机追责，而是急于联络自己的10多名雇主，解释自己这几天“消失”的原因，并且归还雇主家的钥匙……

人们被这位舍己救人而又诚实守信的钟点工感动了。同样让人们感动的，是围绕着何益红受伤后所发生的一连串温暖故事：当一位邻居看到何益红整个人被压在车底之际，立刻招呼10多名好心人相助，协力将宝马车抬起，这些好心人与何益红素昧平生，彼此间也不都相识；何益红的雇主，发现这位从不请假一天的钟点工好几天没有音信，都为她担忧，或寻找，或报警；当得知事情原委后，雇主们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何益红，赠物送钱，关怀备至，而且各自回忆讲述这位钟点工诚恳、勤勉的点滴往事，让我们发现，这“主人”与“仆人”间原来早已情同手足，亲如家人，绝非机械冰冷的雇佣关系；许多有关和无关的市民和单位代表，闻讯而来，探望、问候、宽慰、献上爱心，连肇事宝马的单位也表示要担责；……一位参与救援何益红的邻居感慨地说：“没有事情发生，也不曾感受到这社会上好心人的温暖。”

当人们友善和睦地相处，平静和谐地生活时，对事实上相当融洽的人际关系视若寻常。平时相安无事时，可能并没有密切交往，而一旦突发事态发生，危急关头出现，出自本能的人性瞬间迸发，则会蓦然感觉原来人世间有那么多温馨，有那么多好人。“好人有好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俗言俗语，意境不俗。

这些年倡导确立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人觉得这似乎有点虚无缥缈。其实，价值观最基本的主体还是个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最美钟点工”以及诸多“最美”的凡人小事，还有围绕着“最美”所发生的诸多善事善行。“核心价值观”内涵饱满又实实在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了表述，反映现阶段全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就国家层面而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乃着眼于社会的角度；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对公民个人素质所做的诠释。恰巧发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的“最美钟点工”的故事，正好“写实”了关乎公民个人的8个字，生生地演绎了人间的诚信与友善。

这样的“巧合”并非偶然，以善良著称的中华传统之“善”延绵千秋，“友善”之歌穿越时光隧道，从未休止。 所谓“友善”，就是亲近和睦，亲密友好。用“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十八大代表孔祥瑞的话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倡导一种爱的循环”。孔祥瑞所在的团队强调爱职工、爱企业；队长爱员工、员工爱队长、员工爱企业、企业爱国家。这种“爱的循环”能够拉近人的心，产生无穷的动力，正是倡导友善的一种体现。一个企业、一个团队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也是这样么？

世象杂谈

有一段形象隽永、流传甚广的“凡人名言”云：生活是一面镜子。当你面带友善走向镜子时，你会发现，镜中的那个人也正满怀善意地向你微笑；当你以粗暴的态度面对它时，你会发现，镜中的那人也正向你挥舞拳头。

或许，这就是我们世代祈盼的理想境界，就是最佳状态的“善的回应”、“爱的循环”。

中南海里半日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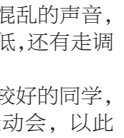
袁念琪

1986年，我走进了中南海。头无桂冠，身不披红戴花，就作为一普通公民；因那时它在节假日对外开放。虽开放的只是局部，但能走进这自1949年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脑和心脏的地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让人倍感新鲜。

父亲的战友送来参观中南海的请柬。两张粉红色是10月1日上午，编号0002841、0002842。另一张嫩黄色的、编号0000116的参观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五时。正面印着：“为庆祝‘十·一’国庆节，请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上午七时至十一时参观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并游览静谷和瀛台。”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背面有《注意事项》5条。

中南海在故宫西面，又称“西苑”和“太液池”。占地面积1500亩，却有700亩是水面。它为中海、南海之统称，南海在中海之北，与红墙外的北海原称“三海”。它始建于辽金，自元、明、清均是皇家禁地。它的东面是北长街和南长街。我们从南长街81号进入中南海。开放的那片地，说是平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所在。维持秩序的，想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战士，虽一身西装，却遮掩不住军人的“范儿”。个个笔直立正，回答简练扼要。

其实，中南海的建筑基本集中在隔开中海与南海那东西向的长条地块上。现在的规模出于明朝，大多为清时所建。翻着导游手册《中南海参观纪念》，进门过流水音往西，过蜈蚣桥到第一个参观地丰泽园，它坐北向南，在瀛台北偏西，西与静谷为邻。东院的菊香书屋是毛泽东故居，内有卧室、书房、办公室、起居室。1949年，毛主席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京，落脚香山。在那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就搬到了这里。



沿着回廊，来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屋内的写字台上，有本台历。翻开的那页是1966年8月19日，我记下这个日子。从那以后，毛主席就搬到了游泳池居住，一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在中南海的日子里，他住菊香书屋最长，有17年；在游泳池则是10年。

旋又来到毛泽东的卧室，屋子里的家具全是本色的。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大床。床的一边是小木桌，有盏小台灯，圆锥形的灯罩是蓝色的。小木桌后，紧拼着一张小写字台。这张木板床朝里靠窗的一边，堆着一排书，早就听说他的这一习惯。与床垂直的是一排四个木制的书橱，无玻璃门。橱的上方有两盏壁灯。那时的视力还可以，还没特为他印制的“大字本”。

故居里是不能拍照的，只能在丰泽园前留影。一旁，有人指着树后一栋三四层平顶楼房说，那是江青住的。住这里，与菊香书屋不算远。“文革”开始，毛泽东搬走了；江青也随中央文革小组搬到被毛泽东认为是“无鱼可钓”的钓鱼台，直到被抓。

离开丰泽园往西是“园中之园”静谷。汉白玉石雕砌的门楼为金刚宝座塔式，五塔分别矗立于两层须弥座上，门额镌刻“静谷”两字。据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女儿曾自的回忆，“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间厢房。”

三面环水的瀛台是中南海游的最后一个去处，过瀛台桥而入，宛如水中一小岛。它建于明朝。现有建筑是清顺治和康熙年间扩建的，1975年进行过修缮。主体建筑从北向南为翔鸾阁、涵元殿、香扆殿和迎薰亭。清世祖顺治题额“瀛台”，乾隆题“海中蓬莱”。

站在迎薰亭环顾四周，没想到中南海里还能划船。望着荡起双桨的人们，映衬着南海喷出的清凌凌的水，如穿梭在绽放的花儿中。

瀛洲壁画 邱振培

莫让老翁当刘翔

魏海波

晚饭后散步时，我常常能看到几个年近九旬的老翁，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常要小辈搀扶。但是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每每在过路口时，不知从哪来的动力，居然能健步如飞、连奔带跑地冲过红绿灯。我不得不好奇地问老翁，您哪儿来这么大的精神头？他苦笑地对我说：“这儿的绿灯亮的时间太短，我不加快速度根本过不去。”我仔细地观察了徐汇区和长宁区的部分路口，自己也模仿老年人的步伐实地演练过，发现不止一个路口，不仅老年，就是青壮年也得以小跑的速度奔跑。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过路口时，尽管流一身臭汗，还是恨不得生就“刘翔”那样百米跨栏的速度，否则只能望路兴叹。

在国内大城市，对老年人来说，“过马路难”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现象，且不说国内的汽车看到红灯依然可以小转弯，而且百分之八九十的司机完全没有行人优先的意识和习惯。所以老人在过马路时，看到绿灯也不敢贸然起步，先得像侦察兵一样，左右观察，打量一番，才敢准备冲刺。

但是，除了无视行人优先的汽车之外，还有难以数清的摩托车、助动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专用车和自行车，常常无视红灯，横冲直撞令老年人无法招架，所以老年人的很多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斑马线上。

老年人毕竟不是刘翔，要让他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过交通要道，确实太难。据统计本市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235万，占本市常驻人口的16.6%，值得注意的是，本市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到2030年本市65岁以上老人占常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0%，上海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城市。

既然老龄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得研究一系列老龄化社会对策，诸如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老年社区的建设、老人设施的完善和建全，都应当是各级领导、各级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就会身受其害。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不管你掌握了多少亿的财富，你都无法回避你也要成为老人的这样一个生理规律。

谈到老人设施的完善，城市的交通路口，红绿灯的设置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点。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红灯亮的时候汽车是不允许小转弯的；其次，汽车必须是礼让行人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人不至于被右转弯的车辆冲撞。他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参考。他们在设置红绿灯的时间时，往往聘请专业交通科研机构对该路口人流量进行长达三个月到半年的测量、统计、调查，之后，才确定红绿灯的通行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根据节假日、早、中、晚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调整的。这样的设置本身已经很人性化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每年根据居民的反映而进行调整。

而我们的绝大部分路口，从早到晚红绿灯的时间是固定的。这样的设置固然简单，但是，它恰恰没有考虑到居民出行的需要，也忽略了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既然，我们人人都要变老，现在也没有什么奇方妙药让老人变成刘翔，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父母们，也是为明天的我们自己多考虑一些呢。

书在读你

周炳揆

对于书的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写的书能够出售给读者更值得高兴的事了。但是，长久以来困惑作者的是，他们无法判断读者何时在看自己写的书，无法了解读者是一口气看完或者是看了三页就扔在一边了。

电子书籍的普及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当人们坐在电脑前看书的时候，软件系统不但能统计电子书籍的销售量，还能知道读者看书的认真程度。一些著名的销售商如苹果、亚马逊、谷歌等，对于读者何时买书，多快看完，甚至是读者的看书习惯，在书上做的标记，什么时候把书扔下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很快就能了如指掌。所以说，当你读电子书时，书可能同时也在读你！

英国有一位作家和出版社约定，如果数据显示读者嫌他的书写得太长，读他的书经常半途而废，则应把消息反馈，他会认真考虑缩短书的篇幅。已经有出版社在出纸质书之前，先通过上述手段作一个市场调研，以决定是否出版。

更为有趣的是，“书在读你”还被出版商用来和读者进行互动。有一家出版商在书上附上一张“选择你的冒险”的表格，读者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甚至故事情节，作者再根据读者的喜好来对原书进行修改，以供再次出版。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和读者的互动不屑一顾。他们认为，这种唯数据为是的做法会限制作者的创造力，以致杰出的文学作品无法诞生。

他们坚称，书就是书，该怎样写就怎样写，和读者的喜好无关，难道有人嫌《约翰·克里斯朵夫》太长，我们就应该删减它吗？

狱中斗智

谢顺铨

敌人已经抓住了她一只手臂，并扭到了身后。情急中，她快速地用另一只手，将衣袋中一个记载抗日工作的小本子拿出，趁着夜色，悄悄地把它扔在路旁的草丛中。扔掉它，就扔掉了机密。她开始无牵无挂，淡定从容起来。

她被捆绑着，带到日军据点。

1940年，不愿做亡国奴的赵衡，放弃了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业，瞒着父母及家人，与同学一起来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那年她只有18岁。1941年，鬼子对新四军所在的盐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赵衡所在的服务团化整为零，分散到乡下打游击。在这次鬼子突袭中，赵衡因来不及撤退而被捕了。

敌人对她的审讯毫无结果，因她已将那小本子扔掉，又改名换姓，编造身世忽悠了鬼子。

几天后，她与前期被捕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三十二人，被鬼子押上一辆汽车，送到位于苏中的日伪军“明德义塾”关押。所谓的“明德义塾”是鬼子与汉奸勾结开办的一所学校，通过精神“感化”来收买人心，培养奴才，以达到日寇“以华制华”的目的。赵衡他们三十三人，大多是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被日伪认为是一些误入“歧途”，可以“感化”的对象，送到这里进行所谓的“感化”。

他们失去了组织，但又很快自发成立了专门对付日伪的中心组。“保持民族气节，坚信抗战胜利。灵活策略地对付日伪。”成为他们的宗旨。

“明德义塾”开始给他们上“和运课”，即所谓的精神讲座。“老师”走上讲台，扫了他们一眼后，便开始发表“演说”，讲得正酣，大家开始发问了：“南京汪精卫政府有没有贪官污吏？”“和平军（即伪军）有没有杀人放火？”“为何日军到处杀害中国老百姓？”突如其来的连续反问，让这个“老师”张口结舌，尴尬无比。只得草草收场。他跌跌冲冲离开讲台，十分狼狈，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第二次“和运课”，换了一个日本人讲课。“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纷纷叽叽喳喳开小会。课后，大家一同到所谓的校长那反映：老师讲课我们听不懂。此后，被日伪认为最能“感化”的所谓“和运课”便一蹶不振，更不用谈有什么效果了。

音乐课教他们唱日寇的《大东亚进行曲》。“老师”十分卖力地教唱，然而，他听到的却是既嘈杂，又混乱的声音，各人各唱各的调，有高，有低，还有走调的。弄得“老师”无言以对。

日伪挑选了几个体格较好的同学，要他们参加南通中学生运动会，以此宣传“优待俘虏”。这些同学就开始“犯病”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腰痛，再就是感冒，浑身无力，饭也不吃。这下日伪又傻眼了，只得息鼓作罢。

这样的明争暗斗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后，日伪无计可施，大概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娃娃，翻不了什么大浪，便将他们做了安排。家在当地的，可以来探望或取保释放。这样，他们与地下党就有了联系的机会。一个逃离计划悄悄在拟定。

经过仔细研究，出逃定在元旦，这时日伪忙过年，无暇顾及。元旦前夜，赵衡几乎彻夜未眠，就要行动了，抑制不住激动，她反反复复在思考必要的准备和应付。元旦早6时，赵衡他们起身，蒙骗过日伪哨卡，一路快速行军，一日滴水未进，终于在星斗满天时到达新四军驻地。

握着同志们的手，他们大哭起来，狱中斗争数月的孩子们终又回到母亲怀抱，回到了抗日大家庭。

十日谈

战地百合

当群英和医护人员、伤员走出几小时后，军部所在位置想起了枪声。